

周总理的丰功伟绩

永 垂 青 史

郑州大学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日

周总理的丰功伟绩永垂青史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了。在这一年中，我们党又遇到了难以抑制的悲痛，敬爱的朱德委员长，特别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相继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正当此时，祸国殃民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妄图乘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的十分现实的危险。在这严重时刻，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遵照毛主席的遗愿，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性胜利，在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确立了华国锋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今天，在欢庆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我们更加充满了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我们党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证明，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英勇坚定的反修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五十多年来，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

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在毛主席领导下，他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们怀着无限爱戴、崇敬、怀念的心情，编写了《周总理的丰功伟绩永垂青史》，以寄托我们的哀思，学习周总理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的高贵品质，实现周总理的遗愿，将革命前辈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反帝反封 献身人民解放事业

周恩来同志，祖籍浙江绍兴。一八九八年生于江苏淮安，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于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淮安度过的。少年时代，曾在辽宁省铁岭、沈阳读过三年书。一九一三年九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从此，他开始了早期的革命活动。

当时，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窃取。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封建军阀依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内践踏人民，对外卖国求荣，弄得国家危亡、人民涂炭。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同志目睹内忧外患的现状，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谋求国家复兴的出路。

一九一三年，周恩来同志和几位同学发起成立了敬业乐

群会，号召大家认识国家的危机，起来救国。一九一四年出版刊物《敬业》，号召青年要为祖国的富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生一日则尽一日之赤心”。在《敬业》创刊号上，周恩来同志写的一篇纪事里，作过这样的记述：一九一四年二月，周恩来同志和三个同学组织社团，“辩难折疑，轶出于课程之外，研究各种学识”。三月上旬，他们邀集了二十多个同学多次开会，酝酿筹建，决定社团名叫“敬业乐群会”。周恩来同志思想先进，品学兼优，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大家都愿意团结在他的周围。当时有二百多学生要求入会，并公推周恩来同志参与起草会章程，选他为社团领导人之一。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努力，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四日，在南开学校礼堂召开大会，宣布敬业乐群会正式成立。周恩来参与主编的敬业乐群会会刊，《创刊词》中有这样一段话：“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年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急时间，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由此表明，年仅十六岁的周恩来同志，就胸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远大抱负，投身于救国救民的活动中了。

一九一五年八月，周恩来同志又负责出版南开学校校刊《校风》。他在同学中组织读书小组，阅读进步的报刊书籍，经常讲演，以自己的进步思想影响和启发周围的同学。他还是南开学校新剧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当时的新剧一扫古代的帝王将相，剧本内容以反帝反封建和揭露旧社会黑暗为主，演的是现代事，用的是白话词，很受工农群众欢迎。这时，他被选为全校学生团体——南开学生会的领导，并任《校风》周刊的总编辑。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周恩来同志在担任《敬业》杂志和《校风》周刊总编辑期间，自己写了许多评论文章和新闻报导，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地理风俗，从世界、国家大事到球讯往来，他都有所评论记述，对丰富学生知识提高学生政治觉悟，起了积极的作用。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一六年写的一篇评论中，无情地抨击了孔丘，他以无可辩驳的理论，怒斥“儒之孔”的谬论“谓误也”。历史是对“四人帮”，特别是对江青攻击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儒”的有力批判。

周恩来同志在校学习期间参加的社会活动，是多方面的。他学习勤奋，精心攻读，知识广博，经常学习到深夜，利用课余时间研究革命理论，领导学生进行革命活动，经常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谈自己对国家命运、前途的见解。他善于团结同学，组织能力强，平易近人，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在学习中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各课学习成绩都很出色。周恩来同志在学校时，生活十分俭朴，常靠自己在校抄写书籍、刻腊板、油印等补贴膳宿费用。同学们都为他忘我地刻苦学习的精神、不知疲倦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所感动。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同志结束了中学时代。南开学校毕业后，他于十月飘洋过海，到日本留学。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同志为赴国难，毅然放弃学业，六月从日本乘船回到天津，住在母校，积极投入并领导汹涌澎湃的反帝爱国运动。

当时，天津的“五四”运动，与北京和全国各地相呼应，正在高潮。“周恩来回来了！”青年们争相传告，都高兴地跑去看他。领导学生运动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为了宣传、

组织、领导这场斗争，急需要建立自己的喉舌——报纸。学联负责人马骏同志，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学联的情况，并邀请他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机关报。周恩来同志欣然答应说：我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既然需要我编辑出版《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

七月二十一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崭新、战斗的姿态胜利出版了。周恩来同志负责起草了《短期罢课宣言》，宣传“五四”运动，并以《革新、革心》为题写了第一期社论，提出了改造社会和自觉改造世界观的主张。《会报》开始是对开大张日报，后来改为对开一张半（六版）三日刊。每期最高日销两万份。除在天津广泛发行外，还远销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它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周恩来同志白天到处奔走，宣传讲演，晚间还经常写稿到深夜。

周恩来同志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研究马列主义。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周恩来同志提议：以天津爱国青年为骨干，成立一个更严密更有力的核心团体，领导斗争。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在学生联合会的办公室里，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等二十个进步青年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大家讨论确定了团体的宗旨、任务、加入条件、组织形式，最后一致决定组织一个以研究马列主义为中心的觉悟社。觉悟社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团体之一。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周恩来同志为《觉悟》亲笔写了《发刊词》，还写了《觉悟的宣言》，其中宣称“凡是不合于现代近代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它为应该铲除应该

改革的……”，“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这一刊物对推动青年们学习马列主义、传播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反动政府把马列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封锁，并派特务进行破坏，对觉悟社的青年进行追捕。周恩来同志组织和领导进步青年，并身先士卒，对反动当局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亲自率领学生上街讲演、游行示威，和反动军警展开搏斗，对天津广大青年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南开学生革命活动更加活跃，天津的反帝爱国运动更加高涨。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由于反动当局加紧镇压爱国运动，学联被查封，并拘捕学生和各界代表，激起了学生的愤怒。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三、四千名学生，发动大请愿，要求释放代表，结果周恩来同志等也被捕。从一月二十九日被捕，到七月十七日出狱，周恩来同志被反动当局关押了近半年之久。在被拘禁中，周恩来同志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与反动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在狱中，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揭露敌人，领导绝食斗争，要求更大限度自由，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把狱中的代表组织起来，给大家讲马克思传、唯物史观总论、阶级斗争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还学外文，阅读杂志，表演戏剧，对斗争的胜利表现了坚定的信心。由于社会各界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反动当局于七月十七日被迫释放了周恩来同志和全部被捕代表。他出狱后编写的《检厅日记》，记载了在狱中刻苦钻研和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还写了《警厅拘留记》，记录了当时被捕的经过，揭露了统

治阶级的残暴和凶恶的反动面目，阐明了反帝爱国运动的伟大意义。

周恩来同志踏破牢门，胜利地走上了新的征途。

赴法、德勤工俭学 宣传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周恩来同志和觉悟社的部分社员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他结识了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等同志。他们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在旅法的中国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一年冬天，周恩来、蔡和森等同志在法国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蔡和森等同志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驱逐回国。一九二二年，周恩来同志由法国转到德国勤工俭学。在德国，周恩来同志又结识了朱德等同志。这年秋天，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为共产党，在德国成立了中共旅德支部，周恩来等同志从此就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中共旅德支部成立的会上，周恩来同志被选为代表，赴巴黎参加中共旅欧总支的成立大会。当时在欧洲共有三个支部：中共旅法支部、中共旅德支部和中共旅比支部。在党中央领导下，在法国巴黎召开旅欧各支部代表会，建立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被选为总支委员，统一领导旅欧各支部的工作。

首先，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先后出版了《少年报》、《赤光》等刊物，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现在还保存着的一件珍贵文物、周恩来同志当年读过的一本书

——《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育》（英文版），还可清晰地看出他用铅笔在马克思的重要论断下面划了着重线：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了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其次，开展了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国家主义派，是以国家主义为旗号，实质是维护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反革命派。其主要头目曾琦、李璜，出版刊物《醒狮》，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有一定影响。为了引导广大青年走向马克思主义道路，清除国家主义派的影响，周恩来同志带领大家和国家主义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周恩来同志不仅在《赤光》刊物上批判他们的谬论，还深入群众进行演讲，多次在群众中间同曾琦、李璜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无情地揭露他们卖国投降，出卖人民利益的反动面目。据当事人回忆：周恩来同志的讲演，非常富有说服力，“听众鼓掌之声震屋”。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国家主义派很快陷于孤立，所有进步分子都围绕在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周围。

其三，有计划地派人到莫斯科学习。从一九二三年三月开始，数次输送旅欧党员到巴黎，其中前两批都是周恩来同志亲自陪送他们到柏林转往莫斯科的。

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到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同志在法国、德国学习工作三年时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坚信不移，永志不变。他在给国内觉悟社社员通信中写道：

“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在前一封信中，又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为它宣传奔走”。

由此证明，旅欧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就已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参加大革命 推翻北洋军阀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周恩来同志遵照党的指示，满怀革命激情，迎着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于一九二四年从巴黎回国，八月份到达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在广州战斗了两年零五个月，先后担任了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黄埔学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等职，并在毛主席亲自主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课程。他坚决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边，同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为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开展工农运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革命根据地，非常不巩固。外有以陈炯明为首的反动军阀的包围，内有阳奉阴违的杨希闵、刘震寰等叛军的叛乱阴谋和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因此，当时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巩固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

地。在完成这一任务中，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黄埔军校中的党团员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二五年二月，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黄埔学生军出师东征。在广大工农的支援下，三月底就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这时驻在广州地区的滇桂军阀杨希 闵、刘震寰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叛乱，形势异常紧张。周恩来同志闻讯，立即率黄埔学生军回师广州，镇压了刘杨叛乱。十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支持下，死灰复燃，重新向革命进攻。革命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周恩来同志担任了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东征军官兵斗志十分旺盛，特别是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教导团，一直冲锋在前，英勇无比。东征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深受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因而在十一月初，东征军就全部歼灭了陈炯明的反动军队，收复了东江地区，取得了东征的胜利，巩固和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北伐胜利的基础。

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大恐慌，加紧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的主张，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当面质问蒋介石，严词斥责他制造反革命事件，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的罪行，迫使蒋介石释放了关押的共产党员。可是由于陈独秀执行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对蒋介石多次妥协退让，却使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广大党团员，被蒋介石赶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事后，周恩来同志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其中一部分党团员输送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成立

了我党直接领导的以叶挺同志为团长的独立团。“独立团”连设党小组，团设党支部，直接由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领导。周恩来同志强调要把独立团培养成一支最可靠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他领导制订了新兵训练计划和干部训练计划，并编写了政治教育提纲，向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不少官兵提高了觉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的基础，因而在北伐战争中能为革命立下不朽功勋，被誉为“铁军”。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北伐军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周恩来同志被调往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等职。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北洋军阀在江浙一带的统治接近崩溃，孙传方的反动军队全部退往江北；北伐军中的中路军和东路军迫进沪宁一线；从北方赶到江南借援孙为名想抢夺地盘的张宗昌奉鲁军后路受到威胁。封建军阀的统治陷于土崩瓦解之势。为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党中央决定举行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同志任总指挥。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广大工人经过三十六小时的英勇战斗，就解决了反动警察部队，赶走了奉鲁军，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荣的一页。由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陈独秀直接控制了上海的工作，使起义所取得的伟大军事胜利，没能在政治上巩固和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尤其严重的是，在起义胜利的当天，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上海，于四月十二日发动反革命政变，胜利果实完全被蒋介石所篡夺。五月间，周恩来同志到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接着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周恩来同志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武装反抗国民党 紧跟领袖毛主席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北洋旧军阀，建立了国民党牌的地主买办阶级专政。这个反动政权，比北洋军阀旧政权更反动更残酷更野蛮。面对这种局面，正如毛主席所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的任务。”为了挽救革命，我们党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指引下，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同志受党的委托，担任这次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

七月底，周恩来同志和贺龙、叶挺等同志一起，率领部队从武汉地区出发经九江到达南昌。七月二十七日，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在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前敌委员会。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紧张地完成了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起义时间预定为七月三十日晚。正当起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九日，身为“中央代表”的张国焘从武汉赶到九江，两次密电前敌委员会，阻挠起义。三十日，他又匆匆忙忙赶到南昌，在前敌委员会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居心叵测地提出种种“理由”反对起义，说什么：“起义须得张发奎（国民党军阀）的同意，否则不可动。”在这严重时刻，周恩来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严厉地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坚持起义按原计划举行，并斩钉截铁地讲“还要干”！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起义时间推迟

了。七月三十一日，张国焘又以修改宣言为借口，提出继续推迟起义。当时，反革命阵营的重要首领汪精卫和张发奎、朱培德等，正在庐山举行会议，策划消灭我党影响下的军队，进一步镇压革命，他们的反革命军队也正在向南昌集中，即将形成包围南昌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再推迟时间，起义必将成为泡影。周恩来同志及时洞察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针对他在宣言问题上的无理纠缠，愤怒地说：“由我来改。”经过周恩来同志和前委其他同志坚持原则的斗争，终于粉碎了张国焘破坏起义的阴谋。

八月一日凌晨近两点钟，在周恩来同志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的指挥下，振奋人心的战斗打响了。参加起义的部队三万余人，出敌不意，深夜攻击，仅经过五个小时的作战，就全歼守敌五个团，完全控制了南昌城。

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斗志，在革命人民的心中撒下了继续革命的火种，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决心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念。一九三三年，毛主席主持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批准以“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也就是今天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日。周恩来同志领导八一起义所建立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革命的史册。

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同志回到上海，长期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又被分派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先后担任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在这期间，周恩来同志为党为革命作了大量的工作。

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长征途中，当中国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险时刻，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毛主席，坚定拥护毛主席为我们党的领袖。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会议还决定：在毛主席的统率下，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参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周恩来同志不仅积极地协助毛主席指挥红军作战，而且时时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红军抢渡金沙江后，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林彪和彭德怀密谋勾结，妄图夺毛主席的领导权。他们污蔑毛主席“指挥的不行”，“拖垮了部队”。林彪还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并写信给党中央要求撤毛主席的职。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党中央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党中央严厉地批评了林彪。周恩来同志同林彪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罪恶行径，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光明正大的高贵品质。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张国焘反对毛主席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提出向川、康、藏少数民族地区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红军到达巴西以后，张国焘更加猖狂地进行反党活动，并妄图凭借武力，危害党中央、危害毛主席，篡夺红军的最高

领导权。在这场激烈尖锐的路线斗争中，周恩来同志虽然身患重病，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多次同张国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始终不渝的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正是由于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周恩来等同志的协助指挥下，粉碎了机会主义路线的种种干扰，才胜利地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在长征途中，周恩来同志不仅是一个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且和普通战士一样，迈开双脚，踏遍了万水千山，一步一步走到了陕北。本来因工作需要组织上配给他一副担架，但他从来不坐，连马也不骑。白天和战士一起行军，晚上大家都休息了，他还紧张地处理工作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分析敌情，布置新的战斗任务，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眠，第二天仍照常和大家一样行军作战。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临过草地的前夕，他突然发高烧，连续两天都在 40°C 上下。因当时医疗条件极差，高烧不退，两天来一直昏迷不醒。毛主席几次去看他，请部队最好的医生诊治，因没药，高烧仍不退。后来就用雪化成水，泡毛巾冷敷，到第三天才清醒一些。紧接着就是过草地，这时警卫员也病了，周恩来同志就把马让给警卫员骑，自己和大家一起在泥泞淤水的草地上走。这位警卫员回忆讲：“我骑马上，看着首长拖着病愈不久的消瘦身体在地上走着，心如油煎一样的难过，多少次要下马让首长骑，他坚决不肯，一定要让我骑着走。”在那茫茫的草地中，一个党的中央军委付主席，并且还在病中，对警卫员那样疼爱，对自己那样严格要求，这种舍己为人、公而无私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怎能不使人们深切怀念！对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怎能不无限爱

戴和敬仰！

长征到达陕北后，全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对于党的方针，实行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清算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变武装反抗国民党为逼蒋抗日的方针。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周恩来同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后，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首先联合和我红军直接作战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通过军事和政治上的种种斗争手段，张学良很快接受了我党主张，并要求和我们党的领导人全面谈判。毛主席委派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在延安和张学良进行秘密会晤。通过友好的商谈，红军和东北军签订了停战、通商和互派常驻代表的协定。不久，党派叶剑英同志为红军常驻东北军的代表，驻在西安张学良公馆。随后，红军又和西北军签订了同样的协定。从此，陕北内战前线敌军变成了友军，一致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形成了在我党领导下的东北军，西北军三方联合的统一战线。对此，蒋介石有所觉察，所以就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亲自到了西安，训示张杨，部署对红军的进攻。但张杨在我党正确方针的感召下，十二月十二日，把蒋介石抓了起来，这就是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

因事变发生很突然，张杨没有一个通盘部署。事变后，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乘机对西安发动战争，调兵进逼西安，企图把蒋介石搞掉，以便取而代之，挑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全面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在张杨内部，他们的高级官员